

厚黑学

钱有灵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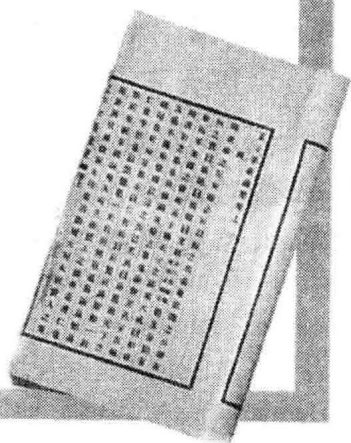


远 方 出 版 社

新厚黑学全书

钱有灵犀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一	钱可买权，权如婊子	(3)
二	权能换钱，钱即嫖客	(17)
三	有权就有利，争权夺利	(26)
四	有利就有害，利害相随	(38)
五	权用到好处，威力无穷	(46)
六	力使到正处，权力生辉	(72)
七	人治是权，权可徇私	(106)
八	法治是理，理直气壮	(133)
九	权乃人赋，好自用权	(159)
十	色是人欲，欲可自制	(165)
	有权有势，势可通天	
	有势无权，势不长久	
	有权有道治天下	
	有权无道丧天下	
	滥用权，纷争	
	巧用权，和平	
	阳者用权，光明正大	
	阴者用钱，暗里运行	
	钱，是杠杆也是陷阱	
	贪，初无厌最终丧身	



十一	祸兮，福所至	(172)
	福兮，祸所倚	
十二	有钱，无力也有力	(181)
	无钱，有力也无力	
十三	钱买名，名不久长	(195)
	钱败名，遗臭万年	
十四	人依法，钱苍白无力	(206)
	人枉法，钱威力无边	
十五	钱积德，也缺德	(211)
	德赚钱，亦添寿	
十六	君子爱钱，取之有道	(216)
	小人爱钱，取之无道	
十七	钱作祟，刀兵四起	(221)
	钱为善，和谐太平	
结 语		(259)



前言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受李商隐《无题》诗的启示，定书名为《钱有灵犀》，为不致造成误解，或把读者引入歧途，有必要简单阐释一下编者的动机和用心。

据说，犀牛角是相通的。李商隐的无题实是有题：爱情，不能比翼双飞，也要心心相印。和谁飞和谁印，我们无从考证也不必考证，用在此处，却有一定的道理在。

权与钱，如喻青年男女，可一见钟情，结为伉俪，但能白头偕老者，恐怕不多，一方失去权或钱，爱则移矣。

权与钱，如喻官员和商人。可一拍即合，勾手弄事，如虎添翼，利益共享。改革开放以来，其势滔滔。一个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不怕丢官丢命。一旦官员丢位，或商人破产，则孤家寡人，或铁牢滋味，也不好受。

贪婪又是人的本性，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林语堂说：凡官僚，皆饕餮。可能失之偏颇，但大体上是不错的。如果不能适量适度适可而止，把握不住自己，势必在滚滚的万丈红尘中越陷越深，最后不可自拔，导致灭顶之灾。前车之辙，清晰可见。

所以，曹雪芹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前句的“忘”字可改为“应”或“要”）。曹老先生生长在温柔富贵乡，老死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艰难境地，可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啊，所以，陈毅元帅有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擒。他不但驰骋疆场，又是文采飞扬的元帅加诗人，更是一名真正刚直不



阿、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共产党人。

又说到了曹雪芹。他说，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人世人生难测，有时转陀螺似的，也说不定何时把您转到官场商场。倘身处其中，“清醒、清白”，最为重要。

倘读者问，你在这里大言说教，又编书何为？我说，非教你学权钱交易也，非教你学厚学黑也，实教你读一点儿这方面的史书史实史学史训，一朝身在其中，洁身自好也。

《资治通鉴》是作甚的？帝王自律！

《钱有灵犀》作甚？读者自律！



一 钱可买权，权如婊子 权能换钱，钱即嫖客

钱与权可以说是官场的阴阳两极。权为官场之阳极，表现为国家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转。钱为官场之阴极。官场表面上体现为政治权力的行使，但在权力行使的背后是以钱为核心的利益的分配和调整，权力的行使决定了钱的花费或决定资金的流向。所以，欲之所存，有钱不一定有权，但有权必定有钱。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进入仕途当官，不仅是求取功名的惟一途径，也是获取利禄的最佳途径。当然，通过权谋取金钱应有个限度，若失之以贪，则有降职、罢官乃至杀身之祸，不免权钱两空，身败名裂。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首古老的民谚，深刻地揭露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几乎无官不贪的现象，但也说明了有权必然有钱的权钱关系。

张汤（？—前115年），西汉时长安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执法官。他一生经历文帝、景帝、武帝三代，但其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

在汉朝众多“以酷烈为天下声”的官吏中，张汤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物。他既藐视权贵，执法不阿，又注重内修私德，居官廉洁，更重要的是，他对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均提出举足轻重的主张，从而影响着汉武帝时期的基本国策。张汤因为断狱严明，深受汉武帝赏识，一再擢升。元狩二年（前121年），张汤被擢升为御史大夫。张汤在此任内共七年，这七年，是他政治生命中最辉煌的日子。每次遇到他向皇帝奏事，即使天色已晚，皇帝也



顾不上吃饭，而是认真听取。有一次，张汤因生病而没有上朝，武帝竟然大驾亲临探视。这一时期，丞相徒有其名，天下大事均由张汤裁决。张汤自己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他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常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对事理透彻的分析，影响着当时的国家政策。

张汤在打击豪强时手法严厉，不畏权贵，自然使一些人对他恨之入骨。这些人中，尤以长史朱买臣、右内史王朝和济南相边通为甚。这三人以前均官居张汤之上，后来被罢官撤职反居张汤之下。张汤为压制他们，又丝毫不讲情面，常当众羞辱他们。三长史恼羞成怒，暗暗寻找机会，欲置张汤于死地。

后来，经三长史精心构陷，控告张汤于职外牟利，使张汤蒙狱自杀。死时“家产直（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即张汤死时值 500 金的家产，都是俸禄和皇帝赐予的正当收入，没有贪污受贿等不正当收入。亲朋好友打算厚葬张汤，但张汤的母亲坚决反对，仅用牛车载着尸体，有棺无槨，十分简陋。汉武帝此时明白张汤是蒙冤而死的，遂杀掉三长史以示对构陷者的惩戒。

张汤在当时被认为是清廉的官员，但就仅值 500 金的家产来说，已相当于“中人”即一般富实人家 50 户家产的总和。据居延汉简编号（37·35）的记载，一位姓侯的富户，家有奴婢 3 人、车辆 4 乘、牛马 7 头（匹）、一套住宅及 5 顷土地，家产仅值 15 万即 15 金，张汤家产为其 30 倍有余。有如许家产犹以其少，其他高级官员的家产当远不止此，可见权与钱的亲随关系。

张居正，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历史早有定评，自然不属于贪官之列。他在未发迹之前，家产不过有田数十亩，家中余粮甚少。但在他死后不久被抄家时，家产折价约合银 195840 两，另有良田 8 万余亩。按照明朝政府规定，一品官的月俸为

87石米，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自然是一品官）10年，加上以前非一品官时20多年的薪金，折银不过2万余两。即便有皇帝的赏赐，也不会达到如此多的金钱。这说明他有掌握内阁首辅大权的人很容易得到的额外收入。一代名臣、贤相尚且如此，“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至于横行天下的贪官污吏，如何变着花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搜刮钱财更是可想而知。

赵在礼是五代时期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后唐庄宗时，他为效节指挥使，在“贝州兵变”中被拥为叛首，并成为唐明宗李嗣源夺取帝位的功臣，此后一再受到明宗的封赏。据史载，他善于聚敛财货，所镇守之地，皆邸店罗列，“凡聚敛所得，唯以奉权豪、崇释氏而已”。赵在礼做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南）节度使时，多行不法之事，百姓苦不堪言。忽然朝廷调任赵在礼镇守永兴，宋州百姓皆欣然相贺道：“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其快哉！”赵在礼闻之大怒，欲报“拔钉”之谤仇，便立刻上表请再在宋州做官一年。当时朝廷姑息勋臣，下诏应允。赵在礼于是命手下官吏，核查户口，不论主人客人，每人交纳一千钱于赵府，名为“拔钉钱”；督责甚严，稍有不如期者，则大加鞭扑，比催逼租赋还厉害。这一年，赵在礼便获钱百万数。人们将极为憎恶的人称为“眼中钉”，此典即来自赵在礼。

赵在礼在利用权力进行经济掠夺方面是比较典型的，但就聚敛钱财的数量方面，比起一些权臣来，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东汉时期的著名外戚梁冀，他的两个妹妹先后为顺帝、桓帝皇后，他在父亲梁商死后继任大将军之职。建康元年（144年）顺帝死后，梁冀依仗其父遗泽和外戚裙带关系，骄横跋扈，与其妹先后拥立冲帝、质帝和桓帝，并毒杀质帝，专擅朝政近20年，将东汉王朝的外戚之祸推向极至。同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财索贿，甚至杀人取财，在近20年时间里积累了多达30亿钱的巨额



资产。

贪财之多，掠钱之巨，要数清代乾隆朝的权臣和珅了。

和珅（1750—1799年），原名善保，字致斋，姓钮钴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高祖尼雅哈纳曾以军功被赐“巴图鲁”称号，并赐封轻车都尉世职。他的父亲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封一等云骑尉。

和珅出身于一个颇有地位的八旗官僚家庭，这使得他从小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童年时代他就和弟弟和琳在家中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打下一定基础之后，兄弟二人一同被选入北京咸安宫官学学习。这所学校最早是雍正帝提议创办的，原来主要是培养内务府的优秀子弟。到乾隆年间，除继续招收内务府子弟外，更多的是招收八旗官员俊秀子弟入学。到这里来学习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选拔出来的，学生不仅品学兼优，而且长相俊秀。和珅生性机敏，记忆力强，在咸安宫官学学习期间，他不仅背熟了《四书》、《五经》，而且满、汉文字水平也提高得很快。此外，还掌握了蒙文与藏文。当时的著名学者袁枚曾称赞和珅兄弟二人知书达礼，聪明机智。和珅虽然为中等官僚家庭子弟，但由于他父亲长年在外做官，开销较大，加之他们兄弟俩与继母关系不很融洽，因此手头并不宽裕。为此在学习期间，兄弟二人曾与家人刘全四处借钱，以补充他们在咸安宫学数额不小的花费。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和珅完成了咸安宫学业。这一年，和珅20岁，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上学时，和珅就被身居高位的英廉看中了，此时，英廉遂将其娇爱的孙女嫁给了他。英廉是内务府镶黄旗人，雍正十年（1732年）中举，当时已是刑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和正黄旗都统的高官。有了这样的靠山，和珅自然是仕途顺利，就在这一年，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

不久在英廉的帮助下，和珅被挑选去给乾隆皇帝当銮仪卫听

差。这差事虽然地位不高，但能接近皇帝，一旦得到垂青，便可以飞黄腾达。于是，和珅便处处留神，伺机博得皇帝的青睐。

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一天，乾隆帝要外出，侍卫人员一时找不到“黄盖”。乾隆帝很不高兴，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问道：“是谁之过欤？”其他侍卫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只有和珅明白皇上的意思，他引用古书上的一句话回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见这个青年侍卫声音清亮，仪度俊雅，一时怒气顿然消失。于是问他说：“你读过《论语》吧？”和珅恭敬地回答说：“读过”。乾隆帝又问了他的家世、年龄等情况，和珅一一作了回答。乾隆帝见他口齿伶俐，十分满意，于是马上将和珅提升为侍卫。

和珅升为侍卫以后，得以常常随侍在乾隆帝身边。他凭着自己的机灵，留神观察，对乾隆帝的脾气、心理、好恶等等，了解得十分清楚。他费尽心机，想法儿使乾隆帝满意，对乾隆帝的心思真是看得准，摸得透。据说有一次顺天府乡试，题日照例由皇帝“钦命”。和珅通过宫内太监，打听到乾隆帝在命题时，信手翻《论语》，当第一本快翻完时，忽然似有所悟，立即提笔命题。根据这个情况，和珅揣摩一番，说：“这次肯定要考《乞籒》这一章。”后来考题发下时，果然不出所料，原来这一年是乙酉年，“乞籒”两字中正好分别包含着“乙酉”两字。由于他生性乖巧，办事能干，深得乾隆帝的喜欢。此后，和珅便在乾隆皇帝的青睐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的职务也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升迁。第二年正月升为户部侍郎；三月升为军机大臣；四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后又屡有升迁和任命。在乾隆晚年、嘉庆初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并管吏、户、刑三部，成为集军政、财政大权于一身，总揽朝政的大臣。

和珅除总揽军政大权外，并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内



务大臣等职，长期管理户部三库。他利用把持的大权，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中饱私囊。

和珅管辖的内务府，负责宫廷服用、食物、武装守备等方面的事务，内廷和皇帝的一切开销都由它包下来。乾隆一生好大喜功，特别好游玩。和珅作为内务府的负责官员，为了满足宫廷奢靡的开支，借各种机会对各级官吏和富商大肆搜刮，和珅本人则借机从中掠取。各地进贡的礼品或外国使臣朝贡的珍宝，首先都得经过和珅这一关。乾隆每次从中不过收取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被和珅吞占。时间久了，和珅家中的奇异珍宝比皇宫的还要多，如大宝石、珍珠串的数量，就是内宫的很多倍。他家所藏的一颗大珠比乾隆御用的皇冠顶珠还大。至于户部、内务府的大宗钱财更是由和珅任意支用，几乎无账可查，乾隆对此从不过问。有一次，两广总督孙士毅出使安南回来，在宫门外等候乾隆帝接见，被和珅撞见了。和珅问：“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孙士毅回答：“是一个鼻烟壶。”和珅要过去看了看，是用一个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成的。和珅爱不释手，便说：“你能否割爱……”孙士毅明白他想索要，急忙为难地说道：“可惜昨天已奏知皇上了，待会就要敬呈，怎么办呢？”和珅脸色微微一沉，说：“和你开个玩笑罢了，何必当真！”过了几天，和珅又碰见孙士毅，洋洋得意地说：“昨天我也得到了一珠壶，你看看怎样？”说着就递将过去。孙士毅一看，正是他进献的那一个，就说：“这是陛下将我进献的那个珠壶赏给大人了。”和珅报之以一笑。事后，孙士毅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根本不是皇上赏，而是和珅通过同党从宫内盗出来的。

和孝公主的异母兄弟七阿哥，有次不慎打碎了一个碧玉盘。这是乾隆帝喜爱的一件珍宝，直径有一尺多。七阿哥怕父皇怪罪，吓得惊慌失措，没了主意。七阿哥的弟弟成亲王让他快去找



和珅商讨对策。于是哥俩同去和珅家。和珅听完了哥俩的诉说，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说：“此物人间稀有，我又有什么办法？”七阿哥更加害怕，竟失声哭了起来。后来和珅答应想法试试。过了一天，和珅一见面就拿出一个盘子，不但比打碎的那一个大，而且色泽更为精美。七阿哥和成亲王感激不尽。这时，他们才知道，四方所进珍品，上等的先入和珅手中，次等的才送进宫去。据野史中的有关记载，乾隆末年，各省进贡献礼的东西，和珅私自侵吞了十之八九，只有十之一二进宫。所以后来嘉庆皇帝在宣布和珅罪状的上谕里愤愤不平地说，和珅家中的珍珠有二百多串，比宫中的多好几倍；罕见宝石有几十个，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都比宫里的好。并下旨将此列入和珅大罪之中。

和珅是乾隆皇帝的红人，位极人臣，与阿桂同掌军机处大权十几年，但阿桂经常奉命到各省赈灾治河，巡察办案，或率军征战，这就给和珅独揽军机处大权以可乘之机。他行文各省，要各省凡给皇帝的奏折都要先向军机处提交副本，这样，各地大员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权利无形中被剥夺，全国都被掌握在和珅的手心里，不得不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听。两江总督书麟、闽浙总督觉罗长麟都因违忤和珅，先后被遣戍新疆效力。这样一来，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内而公卿大臣，外而各省督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纷纷投入和珅门下，争相进贡。而和珅是典型的见钱眼开的人，例行公事时，他也要捞一把，他在兵部核算报销时，如不给贿赂，就找岔子不给报销。至于官员若想晋升，更需要以钱铺路。在和珅那里，大小官职皆有定价，出什么价钱做什么官，比如盐政、河道总督，当时是两个最大的肥缺，标价也最高，官员们必须先以“巨万纳其府库”，然后才能上任。

和珅曾长期负责议罪银事务。所谓议罪银，实际上是为皇帝聚财的措施，又称罚银或自行议罪银，其对象主要是各省督抚、



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大员。他们一旦犯了罪，就必须交出罚银，从而免于或减轻查处。罚银的数额按罪状的轻重不等，但大都是数万或数十万。议罪银的绝大部分都缴入内务府银库，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和珅作为议罪银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使一部分议罪银落入己手，而且可以借此索贿受贿。因为相当一批官员都担心自己随时被议罪，他们觉得与其被罚巨款，倒不如趁早铺垫，向和珅行贿，一旦获罪时，有和珅从中周旋，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这些，和珅一贯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案被揭发，和珅负责查处。国泰、于易简都是和珅的党羽，而且在事发前已用大批银两说了情，所以和珅在查处时，处处敷衍其事，企图使他们蒙混过关。在检查该省库银时，预先通知国泰，叫国泰挪移别银充数。只是因为参加办案的另两位大臣坚持追查，和珅才没能如愿。

和珅勒索百官，不仅明目张胆，而且价码越抬越高，单是两淮盐政征瑞一人，先后就贿赂和珅四十万两银子。有的则不惜代价购买奇珍异宝，投其所好。江苏吴县有个珍珠商，在每个珠子外面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增加了珠子的价值，大粒值二万金，次者万金，最便宜的也有八千金。尽管如此昂贵，官员们仍争相购买，惟恐买不到，因为他们知道，和珅每天早晨都服用一粒珍珠，以延年益寿，增强记忆。

其实，向和珅行贿也并非那么容易。有一个山西巡抚巴结和珅，派他的部下带二十万两银子专程到京城上门献礼，然而进献无门，和府无人接待。这人一打听个中原委，便用了五千两银子作“小费”求见，结果出来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奴仆，张口便问“黄的还是白的？”口气傲慢得很。一听说是白的，年轻奴仆就告诉手下人收入外库，然后给了一纸便条，说：“拿这个回去



为证吧”。说完扬长而去。这人一打听，原来那个年轻奴仆只是一个门子，便连声感叹：二十万两银子竟连和珅的面也见不上，见一个门子倒要花五千两，真是“侯门深似海，和府财如山”啊！

嘉庆四年（1799年），高宗死，嘉庆亲政。为维护其统治，嘉庆帝下和珅于狱，籍没其家财，旋赐死。嘉庆帝在宣谕和珅罪状的诏书中，同时公布了和珅家产的查抄清单，所见者无不瞠目结舌。查抄结果是：

田土八千余顷，房屋二千余间。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金库内赤金五万八千两。银库内银元宝八百九十五万五千多个。珠宝库、绸缎库、人参库都装得满满的。

然而，公布的这些数字，并不是和珅的全部财产，因为这些只是短短几天内查抄记录下来的，和珅转移、隐藏的财产并未包括在内。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有个叫萨彬图的副都统，当时就对此提出过疑问，建议嘉庆帝应继续清查，嘉庆帝知道他的话有道理，但却对此讳莫如深，不表态度，反怪他多言。因此，世间对和珅到底有多少家产一直众说纷纭，便留下了许多和珅家产的清单，其中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流传最广。

据薛福成的记载，和珅的家产，除房屋住宅花园之外，有田地八千顷，生沙金二百余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金银元宝各一千个，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其他如珍珠、白玉、绸缎、珊瑚、玛瑙、宝石、瓷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当时查抄和珅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的二十六号，估价部分值银二亿二千多万两。若接近人梁启超的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则有八亿两之巨，比清廷十年收



人的总和还多。这些财产抄没后，嘉庆帝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他的亲信和大臣，其余的都为嘉庆帝所占有。所以民间广泛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在很多朝代，如汉代（下级官员）、宋代、元代等，官员的俸禄并不高。如果百官以自己的俸禄来维持其家庭乃至家族的生活，显然是非常清贫的，所以，许多官员以贪贿敛财，以弥补俸禄之不足。俸禄是有限的，而贪贿是无限的。官僚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并可随时将权力转化为一般等价物，换来金钱。

不仅官员如此，作为专制制度下俸伺皇帝、地位低下的特殊阶层——宦官，由于他们随侍皇帝，与权力沾上边，也得以利用权力聚敛财富。如东汉宦官张让在任中常侍时，深受汉灵帝的宠信，与宦官曹节、王甫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权倾朝野，故请他办事的人在其门前排成了长队，求见他一面极为困难。张让有位管理家务的监奴，便因此依势敛财，气焰嚣张。当时，有位陕西富豪孟佗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屡次求见张让，都未得逞。当他看到这位监奴的权势后，便转而与他结交，来达到行贿张让的目的。于是，孟佗将其家中所有财富馈送于监奴，使监奴大为感动，便问孟佗有何请托，孟佗说：“我希望你当着众人的面向我行一拜见礼。”这对于监奴来说是举手之劳，他按孟佗的请求当众人排队求见张让之时，抓住良机，率领一帮奴仆迎拜孟佗，然后簇拥着孟佗进入张让府中。众人见此情景，都认为孟佗与张让关系密切，于是，都争着向孟佗赠送珍玩。孟佗此举，可谓一箭双雕。孟佗又像那位监奴一样，广受众人的赠送，不仅弥补了自己馈赠监奴的损失，而且大发其财。他将所受的一部分财物又分送于张让，也使张让十分高兴，便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张让的父亲病死后，归葬颍川（河南禹县）故里，除一些名士外，全郡



的人都参加了葬礼。

唐代的高力士也是一位向百官敛财的能手。有一年，高力士在长安所建佛祠中铸了一大钟，便以宴请达官显贵的名义掠取财富。高力士规定，宾客每敲一次，须出钱10万，作为礼钱。于是，那些讨好高力士的官员连连敲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向高力士行贿。有的人光敲钟一项就向高力士奉献了几百万。有的20次，有的10数次。仅此一项，高力士收入难以计数。

明代的太监大都是极富有者，其拥有的个人财产富可敌国。如王振擅权时，有人弹劾福建参政宋彰，宋彰便送给王振万两白银，王振不仅没有治罪，反而将其任升为福建布政使。宋彰上任后，便加派田赋，收回了送给王振的万两白银的成本，而且还净赚了许多。江阴布衣徐颐、常熟魏某两家甚为富有，二人为了求得京职，便向王振行贿，送去了无数钱财，徐颐尤多。二人因此皆得中书舍人，后魏某又升为主事。京师因此遍传“金中书”、“银主事”的笑料。王振的党羽甚至向进京参加考核的地方官公开宣布，进见王振必须携带礼物。而对于不进见自己者，王振认为是对己不恭，便在考核时施以报复。为了方便送礼者，王振大开其门，来者不拒。送100两银子者是最薄之礼，进去之后，要受到冷遇，只有送千两者，才能在其府中大吃大喝一顿，受到特别的礼遇。在这种风气中，不搜刮百姓以孝敬王振者被认为是庸才，不被重用；而在地方上巧取豪夺，纳贿于王振者被认为是贤能之官，受到奖励和提拔。王振因此而聚敛的财富到底有多少，无法调查清楚。在抄其家时，官方公布的数字是金银共60余库，玉盘100余只，高达六七尺以上的珊瑚20余株，其它珍玩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王振在京城内外的几处宅第，富丽豪华，所费钱财也难以计数。仅智化寺一处，就花费了数十万计的钱财。

被称为“立皇帝”的刘瑾的敛财之术又超过王振，是官僚化

